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4年9月15日

有所思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评析

□李庆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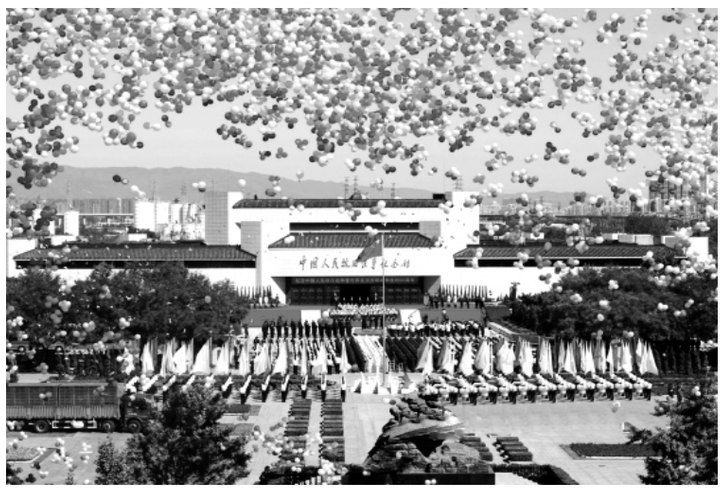
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召唤下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取得的伟大胜利。他的讲话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以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国共两党的抗战功绩。此前，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其中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山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山西忻口战役遗址、湖南常德会战阵亡战士纪念公墓等一批国民党军队抗日遗址和纪念设施入选；同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涵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国民党抗日将士，民主爱国人士等不同群体的代表。

不可否认，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于意识形态、海峡两岸情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游而不击、保存实力”，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日、准备投降”，双方及有关学者往往陷入相互责难、攻讦而无法沟通对话的境地。这就遮蔽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的全民族抗战的真实面目，不仅使亲者痛仇者快——海内外爱国人士痛心疾首，国际上正义人士摇头叹息，而日本右翼势力额手称庆，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地位的肯定。因此，超越国共两党党派的利益与意气之争，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一个非常合适而重要的学术立场和平台，是海内外华人评价抗战胜利之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它超越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各党派团体之上。抗日战争绝不是一个党、一个军队进行的战争，而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涵盖的除了汉奸之外各个党派、团体、军队共同参加的全民族的战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既包括中共领导的广大抗日军民，又包括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广大爱国人士，也包括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国民政府军。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和大陆方面有关学者就已经开始注重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和视角来评价、研究抗战史。198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明确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一次全民族抗战”；并十分罕见地称蒋介石为“先生”，指出，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反映和肯定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作战的《血战台儿庄》电影的上映，也体现了从全民族视角和立场研究抗战、评价抗战已成为大陆官方和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

这样一个共识，随后在学术界的研究中蔚然成风。比如，以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在其有关论文和著作中，大力倡导“民众史观”，从民族（民众）的视角，研究和反映广大民众在抗战中如何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样一个共识，也相继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的活动和中央有关领导的讲话、相关媒体的文章和报道中，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和体现。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是对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考验。”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对这一“英雄群体”的表述，同样出现在习近平同志的这次讲话中。

与此同时，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也逐渐汇聚为一大共识。抗战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这一精神，当年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每一分子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援引当时一篇报纸社评的话说：“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这一精神，也因其具有的穿越时空的价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为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承续担当。

当然，在认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取得抗战胜利之“最大公约数”之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也有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并为这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学界对此多有共识，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实质也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分歧却较大。过去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简单地认为统一战线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另一种观点则一味颂扬国民党的领导。这两种观点比以往双方相互攻讦拆台有进步，但其偏颇偏见也是明显的，让旁观者、国际人士搞不清到底是谁领导了抗战。对此，学界也在重新思考和研究，大陆学者大多认为国共双方对领导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争夺过程。实际上，1947年2月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中曾明确指出，革命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邓小平也说过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值得我们在研究民族抗战问题上认真加以思考。

与此相关联，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论断。对此，有人不那么赞同。“中流砥柱”这个词本身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表述，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比喻能担当重任、起中坚作用的人或集体。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是否担当起重任、起了中坚作用呢？有必要追根溯源先来看这一论断出自何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成立以来领导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在报告结尾部分指出：“三次革命（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作者注）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从历史到现实，充分论证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中流砥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所负的民族责任而具有的担当意识。勇挑民族解放重任，争当民族解放中坚，并实至名归，体现出一个有理想抱负有责任担当大党应有的自信和追求，何错之有？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如果都能像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积极行动起来，勇挑民族解放重任、争当民族解放中坚的“中流砥柱”，不扯皮掣肘，不消极畏缩，不磨擦内耗，不发国难财，岂不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中华春秋

甲午战争中的六张面孔

□马长虹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随着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精进，对于甲午战争中一些人物的看法，史学界有了巨大的变化。现就择其要者，略加阐述。

李鸿章：以前，李鸿章一向被视为“奸臣”，说他在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保存北洋实力”。作为总指挥，李鸿章奏报说，北洋海军仅有八艘主力军舰可资海战，且装备过于落后，后勤保障不足。若与日本海军决战，胜负难料。因此他主张舰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作为战略威慑来牵制对手，使日军在海上活动始终存在顾忌，并寻机歼灭弱势敌舰。简单地说，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判断是，攻固难胜，守则有余。事后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客观的。

对中国陆军，李鸿章知道能派上用场的并不多。以淮军为主体的、担任北洋边海防卫的陆军只有5.4万人，其中机动兵力2.5万人。这些为国戍边的勇营部队，却不在国家编制之内，一应吃穿用度均由地方自筹，身份类似民兵。大清的正规军是八旗、绿营，虽近百万却不堪使用，每年还要花掉清廷2000万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

与之相比，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有12万人，几乎全部投入了中国战场，战时任何一个兵团均在3万人以上，超过中国机动兵力的总和。甲午之战，日本是举国总动员，中国却只是北洋地区总动员。这个是皇帝定的，怪不得李鸿章。

事后来看，李鸿章如果能在自己掌管的洋务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研发力量，自主生产出像日本那样的重火器、开花弹，或许战场上的胜算能大一些。

翁同龢：此时光绪皇帝极为信赖的，乃是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亦是清流党的领袖。清流党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虽饱读诗书却不谙时务，仅凭道德标准议论时政，任何对外妥协的官员，都会遭到抨击甚至被指为“汉奸”。后世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往往是从清流奏章中找到的“史料”。

李鸿章当时的职务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即环渤海地区）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的权限仅及于直隶一省，是地方官员。李鸿章驻节天津和保定，不仅无法直接参与清廷的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

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早就对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必欲除之而后快。翁任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尚书时，1891年全力推出了外购军火的禁令。甲午战争期间，清流对李鸿章及其海陆部将的无端参劾滚滚而来。这些参劾不管事实是否准确，只看是否惊世骇俗，因此往往极尽编造、夸大之能事。如果编造的故事过于离奇，以致君怒罢官，言官反而感觉十分骄傲，认为自己强项敢谏，满朝清流还会以之为榜样。

因为弹劾者只承担有限责任，奏章的杀伤力甚至超过了日军的炮弹。淮军大将卫汝贵冤死刀下，海军统帅丁汝昌险交刑部治罪，均拜清流所赐。有篇弹劾李经方（李鸿章之子）甘当日本人骑马的奏折，极为荒诞，翁同龢却大为赞赏，称其写得“绝妙”。将政见之争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这是翁同龢之过，也是他最终被慈禧和光绪弃用的原因。

叶志超：平壤之战，是甲午陆战的转折点。清军一败涂地，彻底击溃了人们对大清陆军的信心。多年以来，下令从平壤北撤的提督叶志超，被斥责为贪生怕死的“逃跑将军”。但叶志超一向作战英勇无畏，有“叶大呆子”之称，何以在平壤竟判若两人呢？

9月15日，叶志超统率1.5万清军驻守平壤，与1.6万余日军苦战一百天。卫汝贵部盛军、马玉昆部毅军顽强作战，奉军统领左宝贵在恶战中为国捐躯。日军进展有限，整个白天的战斗可谓势均力敌。然而，集结到平壤的清军，都是勇营部队，虽是国防精锐但却不在国家编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接令后火速出发，军火、粮食、辎重等大宗物资，无法随军大量携带，只能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线转运。

清军杂乱而迟缓的后勤，没能及时将弹药、粮食运到。平壤守军15日激战一天后，弹药已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一天同等强度战斗的消耗。最夸张的是加特林机关炮的弹药存量，仅够再发射几分钟。比弹药更困难的是粮食，大部分清军除出征时携带的军粮外，没得到任何补给。叶志超只好就近筹措，但平壤不过两万人口，倾其所有也仅够上万清军维持三日。

在“子尽粮完”的绝境下，叶志超与众将集体会商后，决定假意投降，然后连夜弃城北撤。日军对白天还英勇无比的清军，傍晚突然要求缴械投降满腹狐疑，遂在要道设伏。清军雨夜撤离，陷入重围，溃不成军。

丁汝昌：甲午战争中的海战，远比陆战更为后人瞩目，除了邓世昌的事迹深入人心外，还因为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竟然全军覆没。于是，有人指责海军提督（相当于海军中将）丁汝昌，说他以陆军出身统率海军，使用了错误的阵法，制定了保守的战略。

丁汝昌出身于刘铭传的铭军，是水师军官，后铭军北上剿捻，水师改马队，丁汝昌才成了骑兵军官。这个是有案可查的。但内河水师与大洋上的海军有质的不同。丁汝昌统率海军后，虽十数年勤学苦练，完成了向海军统帅的转型，但他在舰队内部，仍然只负责人事、后勤、舰队活动方针等行政性事务，具体的舰队训练、作战指挥，则由在他之下的左、右翼总兵（相当于海军少将）承担。

左翼总兵林泰曾兼任“镇远”舰管带（舰长），右翼总兵刘步蟾兼任“定远”舰管带，二人均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且留学英国，是真正的“海军专业”出身。应该相信他们选择的阵法、战略，绝不致一无是处。

舰型决定阵法，实力决定战略。黄海海战，中方以横阵迎敌，是因为北洋舰队所有军舰的火力设计，都格外强调舰首方向，横阵才能使炮火威力最大化。五个小时的海战中，中方命中率远高于对手但却惨败的原因，主要是炮弹缺乏且威力太差。北洋舰队以不能爆炸的实心弹为主，开花弹奇缺且不能国产；而日本海军用的全是开花弹，里面填充了自行研制的苦味酸烈性炸药，杀伤力惊人且均为国产，要多少有多少。因此，海战之败是败在科技创新上，而不是阵法抑或战略上。

李秉衡：山东威海是北洋海军屯泊基地，海防上归北洋大臣指挥，但威海城外地域的防务都属于山东巡抚的职责。李鸿章的另一职务是直隶总督，与山东巡抚并无隶属关系，他不能直接指挥山东省军队。因此守御威海军港，特别是其后路的安全保障，没有山东省的配合是不行的。

甲午战争爆发后，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撺掇光绪皇帝调走了与李鸿章默契配合的福润，改任李秉衡为山东巡抚。李秉衡一向是清流党在地方上倚重的实力派人物。

黄海海战，中日各十二舰参战，中方五舰沉没，四舰重创；日方不仅一舰未沉，且用四天就恢复了舰队战斗力。在旅顺未及修复的北洋舰队泊入威海湾时，“镇远”又不幸触礁瘫痪。然而，只要威海后路不失，日本海军是不可能从正面攻入威海湾的。此时清廷已着手与日本政府谈判，保住军港和舰队这块实力砝码，意义重大。

但是，李秉衡为了扳倒并最终取代李鸿章，与中枢的清流们上下勾结，虚张声势，不真正向十万火急的威海派遣一兵一卒，反而在援军、弹药上处处掣肘，坐视北洋海军困守孤岛，弹尽粮绝。可悲的是，后人常常对拼杀殉国的烈士诟病苛责，但却从李秉衡瞒天过海的奏章和义薄云天的口号中找到了“爱国”的史料。

方伯谦：甲午战争中的英雄太多了，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却是十足的狗熊。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一些方伯谦旁系后人的主持下，曾掀起过一段为方伯谦“平反”的活动，但因为没有任何可信的史料依据，并不被史学界认同。

方伯谦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并留学英国，深谙官场之道，备受李鸿章、丁汝昌器重，身为管带却有总兵头衔。与他宦海得意相伴随的，是令人艳羡的私人生活。方伯谦在北洋海军巡历必经的港口，遍布房产和小妾，无论是船到威海、烟台、福州或上海，在他的年谱中都能见到回寓的内容。他的这种行径，被某些人误以为是北洋海军的普遍现象加以指摘。

日子过得太美了，就磨掉了军人的锐气。在丰岛海战中，“济远”高悬白旗，亡命狂奔，见日舰紧追不舍，又挂起了日本海军旗。侥幸脱逃后，方伯谦编造的击伤日舰等一系列谎言，历经后世的影视剧传播，都快成信史了。黄海海战，方伯谦故技重施，在邓世昌与舰同沉之后，夺路而逃，“茫茫如丧家之犬”。

方伯谦误国，清廷、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各舰官兵齐声喊“斩”，那发自心底的怒吼声，120年后的今天，都仿佛能够听见。

甲午战争中可说的人和事太多了。只有了解了真相后，才能信心满满，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扬长避短，去迎接民族新的挑战。

美国镀金时代“舌尖上”的问题

□徐华娟

当美国走过了第一个一百年的时候，正处在任人唯亲、贪污横行的“格兰特主义”泛滥时期。美国记者威廉·哈德深度调查国会腐败内幕后说，这是“国家利益第一次开始被个人利益覆盖的年代”。这一时期也是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勃兴的镀金时代，却是老百姓用不上放心药、喝不上放心奶、吃不上放心肉的年代。“舌尖上的不安全”一直萦绕在整个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初期——那恰恰是美国历史上的腐败高发期，最终催生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最严厉的食品和药品安全立法及其管理机构的诞生。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时代，人们所用的一切物品都是经过工厂加工的工业制成品，都要从商场里买来。因此，企业家们便不择手段，通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来进行竞争，赚取高额的利润，从而导致了那个权钱交易、贪污腐败之风盛行的年代里老百姓舌尖上的不安全。

假药横行

从那些欧洲大陆的移民到美国的时候起，他们的主食只有玉米面包和浸在糖浆里的腌猪肉。人们普遍认为新鲜的果蔬只会导致霍乱，所以很少吃水果和蔬菜。消化不良、肠胃功能紊乱的问题时时困扰着人们。早在祖先们的年代，每当身体不舒服，他们会在家乡的田地里抓一把有药效的草，煮水喝下，肚子就舒服了。可是现在，厄普顿·辛克莱《屠场》里的“伊莎贝塔大娘只能去药店买药，给感觉不舒服的孩子喝下，但她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掺假”。人们在药店买到的、能够治疗他们不舒服的，是一种叫专利药的药丸或糖浆。那是城市里的“有学识的医生”拿来老百姓在劳作实践中得来的偏方，经过“聪明的加工”制成的。通常，这些药丸和糖浆里，都包含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这样的毒品和比例不等的酒精。有的专利药甚至包含高达80%的酒精，没病的人吃了很容易上瘾——要么是毒瘾要么是酒瘾。幼儿园里，为了让小孩一天都乖乖的，就给他们灌鸦片。另外，愚昧的人们在孩子出牙的时候还会给孩子喝一种以吗啡和可卡因为基本成分的“止疼糖浆”。《屠场》里的奥娜由于生活所迫，生了孩子没几天就不得不上班，只能给孩子喝从附近食杂店里买回来的被称为“牛奶”的淡蓝色毒药水。她自己也得了这个工厂里的女工都不能逃脱的“子宫疾病”。所有女工的“子宫疾病”都有着同一个症状——头昏脑涨、腰酸背痛、情绪低落、心情郁闷。奥娜也和工友们一样尝试各种专利药。由于这些专利药都含有酒精或者什么兴奋剂，所以服用之后都能感觉病痛减轻了一些。如果想继续减轻病痛，就要不断地去购买专利药。然而，这笔费用对他们来说，太昂贵了。正是由于上了酒瘾和毒瘾的懵懂无知的老百姓的需要，美国的专利药生产成了“欣欣向荣”的行业。

伪劣食品泛滥

当时美国的大部分肉类加工厂的卫生和质量监管都非常糟糕。在芝加哥的屠宰场里，厄普顿·辛克莱卧底整整7周，他看到了那里的一切。肉直接堆放在肮脏的木制地板上，有肺结核及其他疾病的工人也随口往肉里吐痰。不采取任何清洗措施就把这些肉铲到肮脏的运货车上，从一个房间推往另一个房间，掺上各种根本不能吃的干得像皮革似的肉片和猪皮、绳子以及其他垃圾后磨碎制成了罐装火腿。他们的“鸡肉酱”里的汤汁“也许只有一只穿着橡胶鞋的鸡在里面蹚了一下”，“肉酱”的固态物质就是“内脏、肥猪肉、牛板油、牛心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混合物”。然后，这些东西会被分成不同等级，包装在不同的器皿里，但是，不用怀疑，这些东西都是“从同一个出料口出来的”！

“舌尖上的隐患”的治理

镀金时代的经济高歌猛进，逐利之风催生了假药劣食，但是物极必反，当“舌尖上的问题”成为全民公敌全民公害的时候，它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这种情况逐渐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当反对服用专利药和关于纯净食品、饮料的文章铺天盖地在各类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普通民众似乎觉醒了。对参加美西战争时吃到伪劣罐装肉制品始终耿耿于怀的西奥多·罗斯福更是有着切身体会。那些媒体所曝光的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黑幕，以及厄普顿·辛克莱在芝加哥一个大型肉类加工企业卧底7周之后写成的《屠场》的问世，使整个美国震惊了。小说中令人作呕的段落，让边吃早餐边读书的罗斯福大叫一声，跳起来，将口中的食物吐掉，把盘子里的香肠扔出窗外。那一刻，罗斯福总统下定决心，由政府介入对此事深入调查。可以说，深入调查性的新闻和文学作品引发了美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强烈反应，直接推动了美国政府的顶层治理。1906年6月，美国国会一天之内通过了两部里程碑式的联邦法律——《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和《肉制品检查法案》，并建立了以“好斗的雄狮”、化学家哈维·威利为首组成的11人委员会组成督察机构。这个机构到1927年正式命名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今天，回顾一百年前的美国，正是由于社会良知的存在，媒体舆论的监督，学者的执着精神，促成了政府的顶层设计，最终自上而下进行制度建设，既保护了餐桌上的安全，又促进和维护了市场的良性运行，提升了政府公信力。更重要的是，领导者的改革精神和坚定决心在国家治理中的关键作用。罗斯福总统上任伊始就扮演着反托拉斯的改革者角色。他在给昌西·迪普的信中这样说：“参议员先生，我多么希望我不是一个改革者！可看来我这个角色还非扮演好不可，就像化妆黑人的歌手，全身必须涂个精黑！”

史　镜